文艺报

WENYI BAO　中国作家网网址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　2015年7月27日　星期一　每周一、三、五出版（今日八版）　83

1949年9月25日创刊（总第3892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93　代号1-102

刘奇葆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调研

本报讯　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创作优秀作品为中心环节，在推陈出新上下功夫，在服务人民上下功夫，不断出精品、出人才，不断创新话剧艺术理论，推动中国话剧艺术传承创新。

刘奇葆参观了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详细了解人艺的发展历程和艺术成就。他指出，北京人艺堪称中国话剧的标杆，是深受群众喜爱的国家级艺术殿堂。60多年来，北京人艺群星灿烂，为广大观众奉献了一大批经典作品，涌现了一大批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形成了“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刘奇葆强调，北京人艺要保留好、传承好经典剧目，继承北京人艺特有的表演风格和艺术特色。要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关注火热生活，塑造鲜活形象，反映时代精神，推出更多久演不衰的精品力作。要坚持以团育人、以德培艺，传承发扬老一辈艺术家的道德修养、人格修为，培养更多人品艺品俱佳的优秀话剧人才，为繁荣中国话剧艺术和文艺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中宣部副部长景俊海，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赵实，文化部副部长董伟，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伟，光明日报总编辑何东平和中宣部副秘书长陈永刚，中宣部办公厅主任常勃，中宣部文艺局局长汤恒，北京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海平等陪同调研。

钱谷融：人的问题，应是文艺不离不弃的问题

文艺报：钱先生，您教书育人一辈子，长期从事文学研究和教学，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经验和体会？

钱谷融：说到文学，我最大的兴趣是欣赏。我喜欢读书，喜欢自由自在地、漫无目的地读书。像《论语》《庄子》《世说新语》《陶渊明集》《红楼梦》《三国演义》《鲁迅全集》等，都是我爱读的。因为长期在大学校园生活，对外界情况的了解主要靠读书。书是人类经验最好的保存方式，读书明理，读书要善于设身处地，反求诸己，于心有得，再推己及人，反复思考，以此知人论世。这样读书，一方面自己感到有所增益；另一方面，开阔视野，内心世界得到陶冶，是一件让人十分愉快的事。

文艺报：除了读书，您还有其他什么好的办法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文学？

钱谷融：对我来说，看书之外，就是教书和研究了。这都是大学教师分内要做的事，但我希望在精神上有所超越，不要停留在“稻粱谋”的层次。教书不是照本宣科，一本正经地一路讲下来，而是要与学生交流，教学相长，相得益彰。我从自己的学生身上，是学到不少东西的。如1950年代对我的《论“文学是人学”》的校内讨论中，尽管压力很大，批评意见很多，但还是有学生顶着压力，支持我的观点。这不仅给我以安慰，也让我感受到思想的影响力。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做老师的苦口婆心讲了那么多，学生真会无动于衷？我自己大学时期，就是跟着老师学，受到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慢慢走上了文学研究道路。教学要让人如沐春风，自然而然，心甘情愿，前人总结的经验是有道理的。除了教书，还要研究学问，也就是写论文。这方面我一直比较懒惰，我愿意多看，而害怕写作，偶然动笔，也大都是受到外界的催逼。一旦动笔写作，我是力求在文章中讲自己的话，决不作违心之论。古人云“修辞立其诚”，为文而不本于诚，其他就无足论了。当然，文章水平也是有高下之别的，我向往那种逞心而立、无所顾忌、从心底里流出的肺腑之言，但轮到自己动笔写作时，常常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文艺报：读书、教书与写作，似乎很多学者和作家的生活都是如此，但彼此之间的心态和境界差异很大。您对这一问题怎么看？

钱谷融：我觉得一个人的心态很重要，老是想着向社会发布自己的新见解，老是担心别人将你遗忘，不把你当回事，内心就会焦虑不断。在这种焦躁心态驱使下看书、写作和发表谈话，说话的腔调和论说的尺度难免会有些变形。经别人一反驳，破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更是进退失据，方寸大乱。所以，不要做那种勉为其难的事，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要有自知之明，自己是怎么想的，就老老实实将这些想法写出来，如觉得自己吃不准，就不要装腔作势，故作解人。很多人一辈子都在盲目追赶时代的潮流，要摆脱这种人生的惯性，的确很难。一些人吃亏就吃亏在一辈子处于赶潮流状态，但没有一次追赶上的，更不用说站得住。我想我这辈子很多时间是与时代潮流擦肩而过的，不是说我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很长时间我被打入另册，做了38年讲师，环境逼迫着我接受这样的生活状态。最初遭排斥，错过了宝贵的机会，会有一点懊恼，甚至内心痛苦。但每次都错过，就像赶车一样，你知道反正赶不上，那就不赶了，慢慢走，慢慢看，

看多了，自己也会有一点人生感悟，尤其是与周围那些永远唱高调的人物论调相对照，我慢慢明白了一点道理。世界很大，只要自己用心去做一件事，没有做不成的。很多人生的道理，都是慢慢体会出来的，积少成多，时间久了，会有一个质的变化。

文艺报：读书做事，讲究自然而然，万万不可急功近利。但读书还是有得法与不得法之分。

钱谷融：是的，读书要静得下来，要有闲心。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读书天地，不能整天塞得满满的。如果都是别人要你读，今天读这书，明天读那书，很长时间都在忙于应付外界的事务，而没有自己的内心要求，那样的读书，乐趣大概不会很多，或者变成了读死书和死读书。记得小时候读书，读《三国演义》，刚拿上手就有点放不下，真可以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都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量，能够使你情不自禁、不由自主地产生出好恶爱憎的感情。这种感情，直通你的心灵，深入你的骨髓，将熔铸到你的整个品性和人格中去，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在你今后的处世行事中都会发生作用。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富有诗意和情致，让人感到美，让人感受到强大的理想憧憬和抑制不住的向往力量。这是艺术的魅力所在。所以，我读托尔斯泰、狄更斯、巴尔扎克，与读20世纪的作家作品，感受是有点不一样。有人说，20世纪西方作家的作品，是思想力量盖过了情感力量。但我以为，诗意与思想力量，在文学作品中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不会因为思想性太强，而诗意反倒减弱了。如果真是思想性压倒了诗性，那就说明这种思想不是诗性的，也不是文学艺术的思想感情。在一个真正的作家艺术家身上，思想的力量与情感的力量是凝为一体、相互支撑的。

文艺报：您是不是对20世纪以前的作家作品特别喜欢，而对之后的作家作品有所保留？

钱谷融：这或许与我接受到的教育以及个人喜好有关吧。我喜欢有诗意和情致的作品，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像陶渊明的作品和《世说新语》，语言平实简洁，但情深意切，耐人寻味。外国作家作品，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确是充满诗意，令人难忘。这些作品的魅力，首先来自作家本人，他们自己有真情实感要表达，不是为文而造情，矫揉造作。他们为周围的生活所触动，真情流露。陶渊明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少年情怀与人生坎坷的对照，以及后来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解脱，真正是展现出陶渊明的真性情。所以，真情实感，不是单单拘泥于一点个人的恩恩怨怨、情感得失，而是由己及人，推展开去，有一种豪迈超越的胸怀和不为物累的远见。还有就是《世说新语》中对士人精神面貌的描写，寥寥数语，神韵毕现，可以说是字字珠玑，篇篇精彩。

文艺报：那么，您对20世纪中国的作家作品有些什么看法呢？

钱谷融：我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评价是不高的。好作家不多，堪与世界文学史上一流作家作品相媲美的东西，更是凤毛麟角。鲁迅大概是个例外，我爱读鲁迅的文章，沉郁顿挫，不拘形式，有真情实感，有自己的发现，有传承，有创新，的确了不起。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自己的小说被人认为有着“表现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这句话很恰当地凸现出鲁迅小说的价值。他与当时的新文学家创作理念上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其他很多人是在尝试，做文学实验，而他不是。读他的《〈呐喊〉自序》，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使命感非常强的人，他要呐喊，要捣毁“铁屋子”。这与那些专注于文学改良，热衷于文学实验的创作，心态上和价值取向上是不同的。文学不能太过于工具理性，文学是艺术，是与人的感情生活相牵连，是与美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20世纪中国文学好像还处在一种文学实验的摸索阶段，始终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表现对象和表现格式，很多方面还不够成熟。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文学比较，显得非常突出。中国传统文学，有变化，有贯通，一步一步下来，纹丝不乱。而20世纪似乎有点“慌乱”了，一会儿全盘西化；一会儿弘扬民族文化；一会儿文化激进，一会儿文化保守。这都是“慌乱”的体现。有的研究者说，这是因为战乱和政治动荡，使得创作者和研究者无法沉下心来潜心创作和研究。我想这还不是主要的。像魏晋时期，社会那样动荡，但士人们的表现以及他们创作的作品，堪称经典，影响至今。为什么同为战乱和政治冲击，那时的士人能够沉着应对，写出流芳千古的不朽名篇，而20世纪以来的作家，就少有这种作为呢？20世纪中国，遭遇千古之变，情况当然比传统社会要复杂，但20世纪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的，人类干预自然的能力增强了，作家、研究者在创作上应对世界的能力反倒弱了很多，这会不会与作家、研究者内在价值世界的震荡与混乱有关系？如文学中人与文学的关系，可能至今还有不同意见。但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和文学研究者，心里如果没有人，不关心人，不以同情的态度关注社会上人的种种存在状态，这会影响、甚至削弱他们的创作和研究质量。我今年已经90多岁了，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阅读、交往，对今天的新锐作家的创作了解很少，不知道他们在写作时关注哪些问题。文学创作和研究，各个时代可以有自己的热点和时代问题，但也有相通和一以贯之的问题，我看人的问题，应该是文学艺术始终不离不弃的重要问题。

（辛　雯）

专家研讨海田诗集《长剑当歌》

本报讯（记者　王觅）　7月21日，由中国诗歌学会和第二炮兵政治部宣传部联合主办的海田诗集《长剑当歌》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以及20多位诗人、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海田现任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入伍30多年来，她始终扎根在二炮部队的沃土上勤奋笔耕，创作了歌剧、歌曲、诗歌等一大批文艺作品，并先后出版了5部诗集，是一位有着浓厚军旅情怀和丰富想象力的诗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4年推出的诗集《长剑当歌》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19首军旅题材长诗、组诗，艺术地表达了对火箭兵这支英雄群体的热情讴歌。

与会者围绕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对作者的艺术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大家谈到，《长剑当歌》是近年来军旅诗坛的一部佳作，它不仅来源于第二炮兵部队火热的军营生活，更与作者扎实的军旅体验和对人民军队的深挚眷恋密不可分。作者通过诗歌深情赞颂了第二炮兵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真情描绘了火箭兵追梦圆梦的崭新风貌，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对展示第二炮兵风采、塑造“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形象具有积极意义。作品文字朴实，情感丰沛，很多篇什充满对官兵内心世界的体察和对军人生命价值的思考，具有浓浓的“军味”和“兵情”。同时，与会者还对诗集中的有待提高之处和作者今后的创作提出了中肯意见和建议。

海田表示，此次研讨会解答了自己创作过程中的很多困惑，也坚定了今后继续写好军旅诗歌的信心。作为二炮部队的文艺工作者，今后将继续聚焦军营、情系官兵，为士兵而写、为士兵而歌，努力创作出更多更有分量的作品。

全国青年批评家高峰论坛——

文学如何书写城乡变化

本报讯　7月18日至19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河北省作协主办的“全国青年批评家高峰论坛”在河北崇礼举行。此次论坛的主题为“城与乡：想象中国的方法”。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助理李洱、河北省作协副主席王力平，以及孟繁华、陈福民、程德培等评论家和多位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参加。

李敬泽在发言中谈到，“城与乡”是中国现代性的基本问题，不仅仅是地理区域问题，也涉及到了文化、历史、政治等现代性构造，我国目前处于城镇化的巨大变化中，从乡村到城市，既是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是想象世界方式的变化。如何讲述城市中陌生人的故事，对于当今作家构成了一个挑战。在今天，我们应该重估总体性的意义，以寓言化为表征的否定性总体性其实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归依，而乡村浪漫主义则并不能有效地切入中国经验。我们应立足于活生生、难以言喻的复杂经验进行写作。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时说他的作品有比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著作“多得多的东西”，现在的作家应该思考这“多得多的东西”是什么，如何才能达到。

程德培结合个人的经验谈到，3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不是城市、乡村不是乡村。陈福民以果戈里晚年的文学转型为例，提出重新思考现代性本身与乡村的关系问题。孟繁华结合方方、石一枫小说中的涂自强、陈金芳等人物形象，与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比较，从人物谱系的角度解读了30年城乡关系的变化。王鸿生在发言中谈到，要结合生活方式、生活形态的变化，重新想象和叙述中国人与中国文明，面对人类共同的危机。杨庆祥谈到城乡关系与中西关系、文明与愚昧、传统与现代等都是现代性构造，当代作家无力触及整体性问题，只能以经验主义的方式处理。徐刚则以一些作家用“寓言化”处理现实为例，谈到其中存在的困境。李洱、胡学文、李浩等作家也都结合个人的写作与生活经验，谈到对城乡关系及其变化的理解。

（李云雷）

文洁若畅谈日本文学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著名作家萧乾的夫人文洁若是我国翻译日文作品最多的翻译家之一，许多日本作家的作品都是经由她的翻译引荐才逐渐被国人所熟知的。日前，刚刚度过了88岁生日的文洁若携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做客“首图讲坛·尚读沙龙”，与读者分享了自己与日本文学的不解之缘。此次活动由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首都图书馆共同主办。

《丰饶之海》可谓三岛由纪夫的顶峰之作。这部“大河小说”分为《春雪》《奔马》《晓寺》《天人五衰》四部曲，将作者追求的浪漫、唯美与古典主义发挥到尽美之境。重庆出版社近期推出了新版的《丰饶之海》，由文洁若翻译了其中的《春雪》和《天人五衰》，并为《晓寺》和《奔马》撰写了推荐序。文洁若介绍说，这部小说从日俄战争一直写到20世纪70年代初，其间日本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基本都有所涉及。作者通过佛教轮回转生的传说，将没有血缘关系的四代人联系在一起，既保持了故事的完整性和连贯性，也写出了各个时代的特征。

当谈到如何更好地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文洁若坦言：“翻译没有捷径，唯有勤学苦练。另外要多读书，我家里有很多书，平时不一定都看完，但是到了翻译有需要时，也会临时抱佛脚多看书，这样词汇量就会多一些。”她还表示，丁玲、史铁生、松本清张等中日作家都是自己所喜爱的。

虽然已是耄耋高龄，可文洁若现在依然还保持着工作状态。她不仅坚持写文章，整理萧乾先生的书稿、资料，还在为筹备建立萧乾艺术馆忙碌。她说，“我要一直写到不能拿笔的那一天。”

胡冬林：写作正是为了纪念和保护它们

吉林作家胡冬林与长白山几乎是融为一体的，在那片原始森林里，他辨得出马鹿、黑熊的脚印，能唤来不同种类的鸟儿，还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一截被雷劈断的树桩。从2007年开始，他几乎是整天整天地待在深山老林里，看那些鸟兽草木比自己的亲人还亲。他觉得，对于一个喜欢原始森林的作家来说，长期深入山林是必行之路。走进长白山改变了他的人生和创作方向，就像他所说的，“我发现人生突然有意义了，不但对自己，对整个人类世界都有了新的认识”。

胡冬林心系这片热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让更多人了解白山黑水间的那片山林，懂得保护山林中草木鸟兽的意义。整个长白山地区近山地带有10万平方公里，黑龙江、松花江、鸭绿江从那里流出，再加上天山和完达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生态体系。在胡冬林看来，它们是保护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是保障人类生存的最起码的保障。从这个角度出发，自己便会生发出很多对自然的热爱和担忧。

这样的担忧并非多余，2007年，胡冬林发现一处距长白山保护区仅300米的山火，及时报警避免了山火蔓延。2008年，他举报当地主管部门在保护区砍伐树木、兴建别墅，带记者调查走访20多天。2012年，他发现国家濒危动物极北小鲵的栖息地，建议有关部门采取保护措施，也是在这一年，他举报盗猎分子猎杀黑熊，配合公安机关迅速破案……他把这些故事变成文字、照片，散文集《青羊消息》《狐狸的微笑》出版后引起极大反响，长篇小说《巨虫公园》获得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胡冬林也因此被称为“离野生动物最近的作家”。他说，记下它们的故事，正是为了纪念和保护那些美好的生灵。

这一部部引起读者关注的作品，是胡冬林长期深入生活、扎根原始森林的丰硕收获。原始森林给他带去孤独，也给了他观察森林和动物的好机会。其实，他本人从不会在山林中感到寂寞，在和那些亲爱的“朋友”的相处中，他收获了尊重自然、敬畏生态的美好体验。眼下，胡冬林正在写一部两万多字的长篇散文《金角鹿》，取材于他亲身经历的一起盗猎事件：鹿王跟盗猎分子五次交手，前四次逃过一劫，却在第五次交手时跳崖自尽。对于这个故事，胡冬林的理解是“野生动物用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同人类进行着殊死对抗”，这样的界定让人觉得有几分悲壮，但在这悲壮中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接下来，他还打算出版散文摄影集《原始森林手记》和《原始森林的365天》，后者有春夏秋冬四册，取材于他2007年到2012年间的森林笔记，那五年半他每次从原始森林回家都要写800到1000字笔记，什么发芽了、开花了，遇到什么动物了，都会记下来。这些文字与一张张生动的摄影作品相对照，将成为他对长白山的另一种解读。当然，只有真心热爱那座山林、那片土地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记录与呈现。

“你知道原始森林有多美吗？”他问我。我迟疑了一下，去过，但是……他兀自说下去，“有一天半夜，我送几个朋友去车站，回来的路上在森林里突然看到了一大片萤火虫，它们在静谧的夜里飞舞，像一团温暖的火，我走到萤火虫中间跳起华尔兹，它们就那样包围着我，随着我的脚步旋转。”胡冬林打算把这个场景写成一篇散文，我想，大概读过的人都会像我听完他的讲述之后，吃惊几秒，然后问他：“是真的吗？”他笑了笑说：“当然是真的，这可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李晓晨）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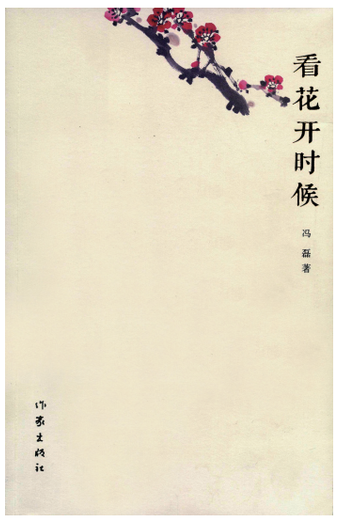
新书贴

《看花开时候》

冯磊　著

作家出版社

2015年5月出版



该书是冯磊的一部诗书画集，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艺术家在诗歌、书法和绘画方面的艺术成就。冯磊的诗与他的书画相映成辉，文笔奇崛，意兴盎然，轻松潇洒，表达自由，内心豁达且无羁绊。读他的作品，会觉得清新流畅，鲜有雕饰，笔色天然，怡人涤襟。

责任编辑：黄尚恩　　新闻版邮箱：wybxinwen@sina.com